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3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3 2006
(第5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5)

华侨汇款对近代潮汕地区农业与农村社会的影响

黄燕华

(华南农业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摘 要:海外华侨对近代潮汕地区农业与农村的积极影响非常突出,海外华侨对潮汕地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其汇款上:一是赡养性汇款;二是投资性汇款;三是捐赠性汇款。这三类汇款对近代潮汕地区农业与农村社会都有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华侨汇款;潮汕地区;农村社会

中图分类号:K82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6)03-0104-06

潮汕地区,包括潮安、汕头、揭阳、饶平、澄海、潮阳、普宁、惠来及南澳等地,位于粤东,以潮州话为主要方言。由于社会动荡、生活贫困等原因,潮汕人自明朝开始向海外迁移,在1860年汕头开埠后达到高潮。据汕头海关的不完全统计:从1869年至1939年70年间,经由汕头出口的总人数高达1130多万人,而同期回归的约1040万人[1]。也就是说净出国人数高达90多万人。移居海外的潮人主要分布在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澳洲、欧美等国家与地区,人数共计约1200多万[2]40。海外潮人不但对移居地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对祖藉地(潮汕地区)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海外华侨对潮汕地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其汇款上。华侨汇款,按其用途,在狭义上指赡养家属的汇款,在广义上则指除赡养家属费用之外,还包括捐赠、投资等其它形式的款项或实物[3]3。本文所谓的华侨汇款指的是广义上的汇款,按广义的界定方法,华侨汇款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作为侨眷的赡养汇款;二是作为投资企业的投资汇款;三是作为公益事业的捐赠汇款。这三类汇款对近代潮汕地区农业与农村社会都有显著的影响。

一、赡养性汇款

赡养性汇款主要是用作侨乡家属的日常生活开支、建造房屋以及购买田地等方面。近代中国华侨汇款大部份都是作为侨眷的赡养费用流入侨乡的,潮汕地区自然也不例外。这部分的华侨汇款对于维持和改善当时潮汕地区农村侨属的生活条件及居住环境,活跃农村经济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维持和改善了近代潮汕地区侨乡人民的生活条件,有利于社会稳定,并刺激了当地市场的繁荣。近代潮汕地区,依赖侨汇维持生活者占总人口40%-50%,有些乡村甚至占总人口的70%-80%。侨汇与侨眷的生活可谓息息相关。以前潮州一带流传的"番畔钱、唐山福"、"七成食番畔、三成靠本地"[4]416等民谚就可以证明,"番畔"指的就是华侨汇款。另外,据社会学家陈达于

收稿日期:2005-05-24

作者简介:黄燕华(1981-),女,广东人,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史.

1934 年在广东潮汕所作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华侨汇款主要用作生活费用。华侨家庭所收入的侨汇平均每家每年为 646.8 元,占总收入的 81.4%,自身的劳动收入平均每家每年只有 147.6 元,占总收入的 18.6%,而华侨家庭的日常开支就几乎占去侨汇的 98%[5]91。还有,据《潮州志》记载:抗战期间,"侨批梗阻,即百业凋敝,饿殍载道。"[6]25可见,侨眷对侨汇的依赖性很强,侨汇输入正常与否直接影响着潮汕地区农村侨属的生与死。所以,侨汇对于维持和改善侨乡人民的生活意义重大;同时,华侨汇款作为侨乡人民的日常消费开支,刺激了当地市场经济的繁荣。

(2)改善了近代潮汕地区侨乡人民的居住环境,并活跃了当地的农村经济。在侨乡,赡养性汇款除用作养家活口外,较为富裕的华侨家庭还会把侨汇用于建筑房屋或购买田地,而且为数不少。正如饶宗颐《潮州志》所记载:"内地乡村所有新祠夏屋,有十之八九系出侨资盖建。"[7]164其实,只有小部分房屋和田地是由侨属出资建造和购买,面积也较小,大多数房屋和田地皆为较殷富的华侨出资建造和购买。关于这方面的具体例子很多。例如,潮州宏安乡洋尾、旗地两新村,是马来西亚华侨沈以成、沈庆副、沈联芳、沈佳趁、沈嘉然、沈祥郡及沈大炳等人于 1870 年至 1872 年间回乡共同建造的,占地达 6.6 万多平方米,其中仅和平里一处,面积就有 8000 多平方米[4]413。两新村的建造,大大改善了宏安乡民们的居住条件。澄海凤塘的"淇园新乡",是暹罗华侨郑智勇在一次回潮州探母时目睹家乡人民流离失所,于是在淇园附近建造的,占地 200 亩。1916 年新乡完工后,郑智勇把那些无家可归的贫苦农民接来定居,规定每户分给房子 2 间,耕地 3 亩,产男丁者给田 1 亩,当时许多附近乡村的贫苦农民都得以入迁;另外,郑智勇还修建了周围 5 个自然村的房屋 635 间,面积约 365 亩,受益 1350 人[8]32-33。在澄海县前美村,泰国华侨陈慈黉家族拥有出租地近 3000 亩和 7 座大院落,其中四座是从 1910 年至二战期间建成,占地共 25000 多平方米,计有大小厅房 506 间[9]34。其建筑物既古朴雅致又富丽堂皇,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在普宁县流沙镇,华侨于 1930 到 1935 年间出资建造了 100 多座楼房,仅泰国华侨陈辅庭就出资建造了 24 座,华侨投资兴建楼房,使流沙镇由原来只有 30 多户人家的小村变成一个热闹的圩镇[7]166。通过上述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华侨出资建房、买地有效地改善了侨乡人民的居住环境,并且活跃了侨乡的经济,使到一些乡村迅速脱离贫困,有的甚至发展成为繁荣的圩镇。华侨之所以会建房、买地,一方面是受中国传统思想——"衣锦还乡"、"落叶归根"等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建房、买地可以实现财产保值或增值的目的,这是在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种特有现象。

二、投资性汇款

投资性汇款主要用于农业、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等方面。虽然近代中国华侨汇款大部份都是作为侨眷的赡养费用流入侨乡的,但是,用于投资方面的汇款也不容忽视。

(1)对农业的投资,极大地促进了潮汕地区农业的开发和发展。近代潮汕地区,华侨对农业的投资主要体现在农业垦殖方面。20 世纪 30、40 年代,南洋潮籍华侨林连登、谢易初、余子亮、王浩真等都曾先后在潮汕地区进行过农业种植,并取得显著的成效。马来西亚华侨林连登回乡探亲时看到当时惠来县的荒山秃岭尚未开发,于是在 1938 年与乡亲林家邦、杨茂水、唐振江等商议在惠来隆江镇西南约 30 里的荒山上合股创办惠民农场,投资总金额为 8.5 万元(林连登占一半股份),农场内共开垦荒地 35 亩,主要种植油桐、白果、菠萝、木薯及部分自给粮食作物[10]85。惠民农场的创办,对隆江镇农业的开发与发展起到促进的作用。泰国华侨谢易初于 1946 年返回澄海县外砂区租地 100 亩,广种菜籽,潜心研究农艺,经过两、三年的努力,终于在家乡提纯、改良和选育出一批蔬、瓜良种;谢易初还把自己农场出产的特优蔬、瓜良种以及从潮汕各地收购的蔬、瓜良种,运往泰国曼谷,并由曼谷销往世界各地[10]86。谢易初对当地菜籽品种的改良和菜籽出口的不断扩大作出了

重要的贡献。泰国华侨余子亮于1947年赞助和支持归侨王浩真在饶平县饶联区塔仔金购地140亩创办华侨柑桔农场,进行柑桔的栽培研究,并提出了防治柑桔黄龙病的有效方法,大大促进了当地柑桔业的发展[10]87-88。通过上述的例子可见,华侨对家乡的农业垦殖是既出钱又出力,不但有效地开发和发展了乡村农业,而且给潮汕农村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同时,还为农民提供了就业的机会。

(2)对出口贸易(以潮汕土特产出口为主)的投资,促使潮汕地区经济作物大面积种植,从而使到当地农村经济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近代,汕头地区出现了许多专门推销潮汕土持产的侨商。其中,以四大公所(南商、暹商、南郊、和益)最为出名,其所组织的出口贸易在当时汕头的出口贸易中占有很高的比例。南商公所是近代汕头出口商最大的同业组织,以经营潮汕土特产出口为其主要业务,运销地点遍及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越南、印尼、柬埔寨和香港等地,其从汕头出口的货物主要有杂粮、果蔬、干菜、干果、潮州柑、柿饼、蒜头、烟、茶叶等[1]。暹商公所是在1909年从南商公所中分出来的,主要从事航运事业,南商运往暹罗的货物皆由暹商的轮船负责运载[1]。南郊公所又称"酱园业"、"莱廊"、"咸杂",侨资约占30%-40%,专门经营潮汕出产的盐制果菜,运销南洋各地[7]169。和益公所又称生果业,侨资约占10%,专门运载潮汕各地出产的水果到南洋销售,以冬天的潮州柑为最大宗,夏天的荔枝次之[7]169。四大公所出口的货物皆以农特产为主,大大促进了潮汕地区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除四大公所外,还有专门经营潮汕茶叶、菜籽出口的侨商。其中,茶叶主要以潮州凤岗乡旅居泰国与越南的华侨居多,因为凤岗有茶山,出产名茶,在南洋一带甚为流行。据统计,华侨在潮汕开办的茶叶商行大概有28家[10]74。其发展大大促进了潮汕地区茶叶的生产。另外,近代南洋各地所需要的菜籽,大多数也是由汕头提供的。例如,当时泰国曼谷越阁最大的两家菜籽行——正大和谢广盛,原籍都是澄海外砂。这两家菜籽行在汕头设立了多间分行,培育、收购和运载潮汕的优良菜籽,远销泰国等地,促使菜籽成为近代汕头口岸的大宗出口货之一,当时出口的品种有萝卜、芥菜、白菜、芥兰籽等十多个[10]。76据统计,1920年从汕头出口的菜籽为3252担,1921年为3665担,1922年为5509担[10]76。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后,以华侨经营为主的汕头菜籽出口贸易就更加兴旺了。通过上述事实可以看到,近代华侨对潮汕土特产出口贸易的投资,对当地农业与农村社会都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一方面促进了潮汕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使到当地的农作物逐渐走向商品化。据记载,潮安鹊巢村在清乾隆年间便开始种植潮州柑,进入近代后畅销南洋各地,获利丰厚,其后潮汕的不少地方也种植潮州柑;至1924年,潮州柑的出口额达到165万关平两[10]80。可见,此类投资使潮汕地区许多土特产成为重要的出口商品,农民看到潮州柑、荔枝、菜籽等经济作物有利可图,纷纷扩种或改种,从而促使当地农村经济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

(3)对交通运输业的投资,改善了潮汕地区农村的交通条件,便利了各地的物资交流,对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华侨对交通运输业的投资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铁路、公路、海运。

首先,对铁路的投资。近代潮汕地区最为著名的一条华侨投资的铁路是潮汕铁路。当时,潮汕地区许多农副产品(潮州柑、茶叶等)闻名海外,但由于交通不便难于外销。为解决此问题,1904年9月,荷印华侨张煜南(荣轩)、张鸿南(耀轩)兄弟集资300多万银元修建中国第一条纯商办的铁路——潮汕铁路,1906年11月建成并正式通车,潮汕铁路南起汕头,经庵埠、华美、彩塘、鹳巢、浮洋、乌洋、枫溪至潮安,1908年延至意溪,全线总长42.1公里[7]308。进入30年代后,潮汕铁路平均每天载客四五千人次,运货100吨以上,除运送大米外,还运送水产品、水果以及农产品等[3]。潮汕铁路的建成,使潮汕等地的土特产能够及时外销。正如当时社会学家陈达调查所指出:"韩江流域的谷米、蔬菜都因铁路之便,销路更旺……潮汕铁路两边的柑,遍地皆是。据汕头生果铺估

计,每年出口总计不下国币 300 余万元。上列各种产品,大致由铁路输往汕头,或运国内他市,或南洋。”[5]180可见,潮汕铁路的修建,对促进各地物资的交流,农村经济的活跃以及海运贸易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除此铁路外,还有汕樟轻便铁路等多条侨办的铁路。这些侨办铁路对于改善潮汕地区的交通,繁荣农村经济同样起到重要作用。

其次,对公路的投资。当时侨办的公路有很多,而且对农村贡献很大。例如,泰国侨领郑智勇于 1917 年在潮州嘉兴独资修筑两条石灰路,一条从故乡淇园通向东面的浮洋圩,长 12 华里;另一条从淇园通向潮州城,长 13 华里[4]275。这两条大道经过大片田园和许多村落,村民和商旅往来都受益不少,并有效地带动了沿途乡村经济的发展。华侨还投资修建了汕樟公路。公路由汕头至澄海樟林,1928 年开始建筑,1932 年建成,全长 70 华里,投资总额 32 万银元,华侨投资占 37.5%,其中泰国华侨投资 5 万银元,新加坡华侨投资 3 万多银元,香港同胞投资 4 万银元[5]197。汕樟公路通车后,澄海、饶平等地的土特产可以通过此公路运至汕头,然后通过海运转销到我国沿海各商埠和香港、澳门以及东南亚等地,大大促进了澄海、饶平等地乡村的开发和发展。另外,汕樟公路的修筑对于方便汕头和澄海之间的商旅往来,促进近代汕头、澄海以及饶平等地的物资交流,发展对外贸易等方面也起到积极的作用。安凤公路是在 1928 年由越南华侨陈拔奇筹集资金 4 万银元(陈拔奇自己投资 2 万银元,占全部股份的一半)修筑的[7]313。由于潮安县凤凰山区,盛产名茶,山货丰富,但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凤凰一带还没有公路,交通不便,严重影响当地的发展;因此,华侨投资修筑安凤公路,公路自潮州城湘子桥东畔经东津、意溪、银潭、文祠、石坑至黄竹洋,北入饶平大水溪界,再由大水溪至凤凰墟,全长 37 公里[7]313。其通车改善了潮州城至凤凰一带的交通条件,改变了凤凰山区闭塞的状态,凤凰山区的各种土特产可以通过安凤公路运抵潮州城,然后再转运到海内外各地销售,有利于了凤凰山区的开发与当地经济的发展。

对海运的投资。自汕头开埠后,出口贸易日益兴旺,许多潮汕土特产也得以外销。为了改善海运的交通条件,许多华侨出资发展潮汕地区海上的航运事业。其中,经营海运事业最为著名的华侨船务(轮船)公司有:黉利船务公司、华暹轮船公司、元亨轮船公司等。黉利船务公司是由泰国华侨陈慈黉家族创办的,主要航行于汕头、香港、曼谷、新加坡、上海、青岛、天津等港口之间,其主要从汕头运送潮州柑、茶叶等土特产到南洋各地,又从泰国等地运送大米到汕头等地[9]33。这不但缓解了潮汕地区米粮不足的情况,而且对促进潮汕与南洋之间的物资交流起到积极的作用。华暹轮船公司是泰国华侨郑智勇于 1905 年创办的,共购有 8 艘轮船,分别航行于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越南、香港、汕头、厦门、上海和日本等地,其中有 4 艘专门行驶“汕暹线”,南商运至暹罗的一切货物皆由其负责运载[11]98。元亨轮船公司是越南潮侨郭琰于 20 年代创办的,航行于越南、香港、汕头之间,从汕头运送的货物主要有米粮、棉花等土特产[10]39。当时从事海运的侨办船务公司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其运载的货物主要以南洋及潮汕地区的土特产为主。潮汕海运事业的发展对活跃农村经济意义重大:一方面,促进了潮汕等地与南洋之间的物资交流,满足了人民的物资生活需要,改善了各地人民的生活;另一方面,随着潮汕地区土特产销路的日渐兴旺,也带动了潮汕农村经济的发展。

三、捐赠性汇款

捐赠性汇款主要用于兴修水利、赈灾救荒、兴办教育等方面。近代中国的侨汇一般是用于消费性的,如之前提到的赡养性汇款(主要用于生活消费和建房买地);用于投资生产的汇款相对较少。这两种汇款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在前面已作详细论述。除上述两种汇款外,还有一部分用于公益事业的汇款,如兴修水利、赈灾救荒、兴办教育、创办医院等,其对农村人民生活的改善

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起到积极的作用。

(1)华侨捐资兴修水利,有利于潮汕地区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水利建设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农业的收成和农民的生活。据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调查材料计算,汕头地区,华侨于1862－1949年间对水利的捐资额高达79767058元,占全省水利资金的20.73%。[7]313由此可见海外华侨对家乡的热爱。20世纪初期,潮州韩江北堤由于年久失修,每逢汛期,便多处崩决,严重影响韩江两岸及下游农业的收成和农民的生活。面对此情况,泰国华侨郑智勇于1918年初捐资7万多银元在北堤堤身松动的地方,筑三合土龙骨,并在其它堤段填石、打桩、添筑石篱等,使北堤得以修复[10]82。1918年2月,韩江南堤因受地震牵动,罅漏百出,若逢江水暴涨,便会冲决堤防,韩江下游的田园、房舍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都会遭到严重损失,于是,郑智勇又"捐金钜万"作为修复韩江南堤之用,对南北堤捐资累计白银38万两[10]82。韩江南北堤的修复使韩江两岸及下游的农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另外,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潮安县江东的西陇堤数次崩溃,严重危害江东地区的农业生产以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此,新加坡潮安籍华侨廖正兴、刘荣丰、杨缵文和马来西亚澄海籍华侨李伟南等,共捐资2.97万银元,作为修复西陇堤之用,并于1927年竣工[10]84。西陇堤的修复为江东人民解除了水患,有利于当地农业生产以及人民生活的恢复。华侨捐资修水利的事例还有很多,如泰国华侨余子亮曾于20世纪40年代捐款整理黄冈河等[10]84。

(2)华侨捐资赈灾救荒,缓解了农村的灾情,对人民生活的改善以及社会的稳定起到一定的作用。潮汕地区天灾连连,造成广大农村农业失收,粮荒严重,饥民遍地。每每出现此种情况,华侨出于爱国爱乡之心,必慷慨解囊。1922年8月2日,潮汕地区发生"八·二"风灾,沿海各地河堤崩溃,房屋倒塌无数,农作物全部被毁,被溺死者多达3450人。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闻讯合力赈济,成立"暹罗潮州飓风海潮赈灾会",先后募款25万铢;新加坡潮籍同乡募款三四十万元,并运来赈米、药材等一大批[7]172。华侨的救灾大大缓解了风灾所造成的损失。1937年下半年起,潮汕地区闹粮荒,泰国潮州会馆组织潮州米业平粜公司,运载暹米到潮汕平卖,使潮州米价不致因粮荒而高涨[7]172。1943年揭阳饥荒,泰国华侨林运秋带动旅外乡亲捐大米15万斤,并亲自回榕城赈济乡民[7]172。1946年,潮汕地区发生严重春旱,农田勉强能播秧的仅占十之三四,收成仅有十之一二,当时全国灾情也极为严重,灾区多达19个省,灾民不下3000万人。面对这种情况,泰国华侨立刻成立"暹罗华侨救济祖国粮荒委员会",开展募捐救荒运动。历时两年七个多月,先后运送赈济粮八批共165770包半,募捐金额达2000余万铢[12]69－71。类似的救灾活动多不胜数,难以逐一列举。

另外,华侨捐赠性汇款还有用于兴办教育、创办医院等方面,对潮汕地区农村社会的发展同样有积极的影响。在乡村捐资兴办教育,有利于提高潮汕地区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知识水平;而在乡村捐资创办医院,则有利于患病农民能够及时获得治疗。对于这两方面很多学者已做过详细的论述,在此不再重复。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捐赠性汇款对潮汕地区农业与农村社会也有非常积极的影响。一方面,在潮汕地区受灾的时候,它能尽快恢复农业生产,缓解灾情,改善灾民的生活;另一方面,它又能改善潮汕农村的教育条件和医疗条件。

综上所述,无论是赡养性汇款,或是投资性汇款,或是捐赠性汇款,其对近代潮汕地区农业与农村社会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但维持和改善了当时潮汕地区农村侨属的生活条件及居住环境;另外,对促进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改善农村的交通条件,刺激农村市场的繁荣,活跃农村经济等方面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饶宗颐. 潮州志[O]汕头:潮汕修志馆,1949.
[2] 郑一省. 海外潮人与潮汕地区的经济发展[J]. 八桂侨史,1997,(1):40 - 44.
[3] 林家劲,罗汝材,陈树森等. 近代广东侨汇研究[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
[4] 刘　权. 广东华侨华人史[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
[5] 陈　达. 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M]. 上海:商务印书局,1939.
[6] 邹金盛. 泰国潮帮批信局史研究[C]//政协澄海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澄海文史资料(5). 1990.
[7] 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广东省志·华侨志[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8] 冯汉桐. 著名侨领郑智勇[M]//载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潮州市外事侨务局编. 海外潮人. 潮州:潮州市湘桥文星印刷厂,2004:31 - 34.
[9] 袁伟强. 陈黉利家族发展史及其社会功绩[C]//澄海文史资料(第十六辑). 广东省澄海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广东省澄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7.
[10] 杨群熙. 华侨与近代潮汕经济[M].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
[11] 林金枝,庄为玑编. 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集(广东卷)[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
[12] 张映秋. 战后泰国华侨救济祖国粮荒运动[C]//政协汕头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汕头文史(10),1991.

A Study on the Influences of Overseas Chinese's Remittance on the Modern Agriculture and Rural Society in Chaoshan Area

HUANG Yan-hua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Abstract: The Overseas Chinese have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industry, the commerce, the real estate and the finance of Chaoshan district in Modern Time. Many shcolars have studied on the above points, but they've ignored the influence of overseas chinese on the local agriculture. In fact, the active influence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to this district is obvious.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Chaoshan district is mainly in the form of remittance:1. remittance of alimony; 2. remittance of investment;3. remittance of donation. the three kinds of remittance influenced greatly the Chaoshan district's agricuture and rural society.

Key Words: Overseas Chinese's remittance; Chaoshan Area; Agriculture; Rural Society; influences